

1613



第二辑

邓县文史资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河南省邓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前 言

《邓县文史资料》第二期现在出版了。

在第一期出版后，许多同志争相阅读，都想知道一些有关邓县的历史。与此同时，又对本书提出很多宝贵意见，足见大家对本书是非常爱护的。我们政协文史委员会对此向大家表示感谢。

现在，《邓县文史资料》第二期同第一期一样，在我县党政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又出版了。出版前我们对稿件仍然严把四关（观点、史实、文字、时限）作了多次研讨，紧张工作了一段时间，才于今天和大家见面。但我们不是一个专业写作班子，大家都是兼职，研讨、修改都是在百忙中挤时间作的，又因我们水平的关系，错误与遗漏，在所难免，仍希同志们多多帮助，俾得及时改正，使本书健康成长。

邓县政协文史委员会

一九八五年元月

ZA83/15
政协邓县文史资料第二辑

目 录

- 启蒙(往事漫忆之一)……………孙 鼎(1)
- 邓县历史上的水利工程……………骆立群(9)
- 渭华起义部队在邓县的遭遇……………李训祥(32)
- 朝华夕拾(记我的小学时代)……………孙晓宇(39)
- 樊钟秀与邓县……………刘西藩(47)
- 诱敌中毒……………徐天增(51)
- 我被“伏牛山工作组”逮捕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宁志沈(53)
- 在榆林村的一次战斗……………李屏华(56)
- 邓县人民医院简史……………姚万绪(58)
- 邓县文物古迹分布情况……………李云生(64)
- 邓梨……………牛金荣(76)
- 邓县烤烟始种年分考证……………杨文录(80)
- 河南烤烟始于邓县……………陈松峰(82)
- 邓县最后一个反动统治者——丁叔恒……………林书运(87)
- 登春风楼……………刘西藩(102)

启 蒙

(往事漫忆之一)

孙 鼎

我生于一九一八年，家住邓县城西北二十五里光 伟 村（现名和平村）。七岁时跟着三哥（名甲庭，又名浩然）上村塾。入学要拜见先生（塾师），即向先生磕头，这是传统老规矩。学屋就在我家前院，过去养蚕的两间屋子。开有几个窗户，倒也宽敞明亮。一、二十个学生，沿墙倚窗屋放桌凳坐着。早晨上学，主要是朗读、背诵头天的课程。早、午饭后，都得很快到学屋里去，写大字（写仿），然后念书、背书。背书后，先生分组分人给学生上书（教新课）。小学生只念书、背书、认字，不开讲。大学生开讲，先由先生讲，学生听讲后熟读、背诵，然后再到先生面前复讲，让先生纠正。

由于父亲曾在开封上过学堂，他要先生让我读新共和国文：“人手足刀尺，山水田、狗牛羊”。以及“大狗叫，小狗跳”。书上有字有画，很吸引人。这些书易懂、易读、好记，开始读书也不觉得有多大困难。其他学生，还是读的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。他们对这些书，会念会背，也可算认得字，但不懂内容意思。如：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”，他们就不知道是啥意思，只是会念会

背罢了。一次，一个小学生背《三字经》，把“有典谟，有训诰”背成“油卷馍，肉汤泡”，先生火了，一边打他一边说：“你吃的怪美哩！”

学生在私塾里，整天就是写字、念书、背书，机械呆板，生活枯燥。实际是一条无形的绳索，将活泼爱动的儿童束缚在学屋里，和坐牢差不多。因此，学生总盼望先生有事回家，甚至盼望他害病，好多玩几天。

塾师给学生定了好多规矩，除解手外不准离开学屋，而解手只能一个一个地出去，那个学生不回来，这个学生就不得出去。当时的心情：就是在厕所里多待一会也是美的。但是，解手的时间长了，也会受先生申斥的。在村塾里上学，正象宋湘《忆少年》一诗所写：“老屋柴门树打头，青山屋后水门流。受书十日九逃学，恨不先生命放牛”。

塾师体罚学生是家常便饭，也是天经地义、合理合法的。塾师，还有家长，都认为：学生不用心读书，一打就用心了；学生不会，一打就会了。其实，越打学生越怕，思想越紧张、越拘束。“灵感”打跑了，成个呆子；或者是干脆不来上学，逃之夭夭。这真是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教学形式，什么时代有什么时代的教学方法。

由于匪荒，我家搬到城里去住，从此结束了在村塾的读书生活。

我十一岁那年，就是一九二九年，二姐（香阶）在女校（城隍庙）教书，我和三哥到一小（黄学）上学。三哥上五年级，我上三年级。刚一进城，又上一小，觉得世面真大，学校更是雄伟壮观。校院很宽、房子很多，学生足有二三百人，教师二十多位。有足球场、篮球场。我们三年级的课程

有国语、算术、自然、美术、音乐、体育等。一个老师教一门课，一堂一换，真有意思，从不感到厌烦。一切都是新鲜的，真是进入了一个新天地。每天上早学我总是起得很早，到学校时大门还未开。不少小同学也和我一样，坐在大门外等开门。大门开了，进入教室，黑古隆东的，也还是坐着玩。但这表明了童年时期对新鲜事物的向往和喜爱。

小学时代，有几位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：吴寿青，大高个，四方脸盘，浓眉大眼，走路沉稳有力，讲话声音洪亮，能吸引人。汪琴声，四十来岁，陕西口音，戴着眼镜，对学生循循善诱，和蔼可亲。张建华，豫南口音，年轻精干，外号铁胳膊（因他善于打拳，臂力过人）。还有李子平、宋任远等老师，都深受学生们的敬爱。这些老师在学生中不是可怕、而是可亲，都想接近他们。好象他们身上带有磁铁一样，吸引着学生。

学校的空气很活跃、很自由、很热烈，真是一个蓬勃向上、意气风发的学校。课外时间，校院内一片歌声，都在唱着这些老师教的《打倒列强》、《可怜的秋香》等歌子。每逢星期六下午，不是演新剧，就是讲故事，或举行讲演比赛。记得有一次演《孔雀东南飞》，刘兰芝的遭遇激起了同学们的同情。演刘兰芝的同学在台上哭，看演剧的同学在台下哭。真是台上台下泪相连，一片凄楚之声。这不仅激起了对刘兰芝的同情之心，而且鼓起了同学们向封建势力斗争的勇气。

当时讲演比赛，一是各班自己组织举行；一是各班选人全校进行比赛。一次，我们班推选我参加全校比赛，我要求三哥给我写讲演稿，他不干，要我自己写，这可难住了我。没办

法，只好自己想了想讲的内容，记在心里。星期六的下午到六年级教室进行比赛，我讲：“上私塾，读四书五经，考秀才、举人，死八死九的。不如上学校，学科学，讲实用，学体育炼身体……要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军阀，推翻旧世界，铲除黑暗势力……”。每个同学讲完后，都有一位老师评论的，从内容到态度指出优点、缺点。我讲后是王绍泉老师评论的，王老师评论后，张建华老师又上台对我进行表扬，说我讲的内容好、思想新，我心里美滋滋的，受到了很大的鼓舞。故事会、讲演比赛、演新剧，既使学生受到了革命的教育，也锻炼了学生的口才、胆量、能力。不是读死书，而是活读书，为以后进入社会学得了应有的知识，培养了一定的能力。

汪老师、吴老师有时叫高年级（五、六年级）学生开讨论会（那时五、六年级学生都是十七、八岁，也有二十多岁的，最小的也有十三、四岁）。先在黑板上写出讨论题，晚上可在大成殿前面月台上围到一起讨论。三哥照例要参加，我也跑上去看。讨论会上有些同学说的很带劲，有些也胆小不敢说，不过说着说着都胆大了，有时还争着说。有时发生争论闹起红来，可是也不恼。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是不大懂。有一回，他们讨论“人生观”，下来我问三哥啥叫人生观，三哥说：“就是人活着为的啥？”以后，我常想：人活着为的啥呢？

有一部分学生暗中传阅一些书籍，这些书在图书馆是借不到的，同学关系不十分亲密的也是见不到的。三哥经常带这类书籍回家在夜里看，因而我也有机会看到。这类书籍多是毛边书，其中有《少年漂泊者》、《鸭绿江上》、《呐

喊》、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青光》、《悲惨的世界》……。这些书我有的看不懂，有的也懂得一些。多是说人民受压迫、受剥削，在黑暗的旧社会里挣扎和斗争。

学校里成立了“学生自治会”，东庑下有两间房子是学生自治会的会址。负责人有孙题录、赵振刚等，常在那里的有袁森林、杨应麟、丁家志，还有个个子不高的孙天恩和我三哥，女学生有孟昭莲。学生自治会设有裁判股、纠察队等。学生自治会什么都管，讲演会、故事会、演新剧、到校外宣传等，都是自治会组织、安排的，有的聘请老师指导。就说纠察队吧，在没上课以前，提前到校在大门口站岗，不准不三不四的人到学校里去，找人会客须经纠察队员去传。下午课外活动时间，还有纠察队员巡逻，解决同学间的争执、纠纷。学生自治会规定不准教师吸烟，违者每月罚洋一元，有一位教师吸烟被罚，感到羞愧而离开学校。自治会还规定教师不准体罚学生。有些星期日，组织学生到农村宣传：帝国主义侵略中国、压迫中国人民；军阀打仗苦害老百姓；官府黑暗敲诈勒索老百姓。学校还办了“平民夜校”，进步的老师去讲话，高年级的大同学去教识字。总起来说，学生自治会的权力很大，管的事很多，学校的事没有他不管的。

这些老师们经常对学生讲话，说列强企图瓜分中国、侵略中国。国民党腐败黑暗，勾结帝国主义压迫、剥削人民。还讲到中国的前途，青年的使命。一次宋老师讲到国家面临危亡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我们要努力奋起，救国救民……说得声泪俱下，同学们都深受感染。

有一次张建华老师外出了七八天。在这期间，县长边万选带着护兵来学校转了一趟。张老师回校后，在全体学生会上

气愤地讲了一番话：“什么东西，还想伸进学校里来！再来，把他轰出去！”

我们在一小上学，在这个环境中生活，思想是解放的、无拘无束的，是自由的、奋发向上的。我们认为：帝国主义、军阀、国民党、旧政府、地主、资本家，都是坏东西，都是压迫人民、剥削人民的。这些人当权执政，中国是没有前途的，非打倒这些人不可，非起来革命不可。当时就养成了一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性格。一次，我们几个学生在街上走，对面走来一个当兵的。我们说：“烂丘八，光会欺负老百姓，今天不给他让路”。说着，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去，他只好给我们让路，站在路边斜眼看着我们。那时我认为对旧政府旧官吏只有硬拚，这真是儿童天真的思想。

城内的学校，还有县立初中（在春风阁）、女校（在城隍庙）、几所初级小学。一小的革命教师和各初小的校长、老师来往较多、关系密切。和县中、女校的校长、教师没有来往。当时我二姐在女校教书，总说一小不好，三哥偏说一小好、女校不好，两个人吵起来，我总是帮着三哥和二姐吵。象这样的家庭纠纷，当时是很多的，有的甚至吵得打起来，或互相不说话，谁也不理谁。

深秋时节，五、六年级的同学们的活动和神情，好象有些不寻常，总是三三两两地不断到那些老师屋里去。三哥和我同路回家，却很少说话，脸绷得紧紧的，晚上不断往学里跑。

事情终于发生了，听说他们一伙大学生竟然端了教育局长王进之的烟盘子，还要他每月交罚款两元。又听说他们约会小商小贩打了税局。

有一天上午，五、六年级的同学特别忙碌：有的拿纸，有的刮小竹批，有的在研墨，有的在写。他们没有上课，忙了一晌。下午上堂的时候，全体同学集合，每人发一个小纸旗，都在卷着，交代不让展开。队伍向小东关关帝庙集合，除一小的学生外，还有自治训练班的成人学员，和各初级小学的师生，还有一些小商小贩。就是没有邓中、女校的学生。各校到齐后，六年级同学张万寿上台讲话，他激昂慷慨地说：“边万选是贪官污吏，他敲诈勒索老百姓、压迫老百姓，你们说该不该打倒边万选？”下边的学生一致呼喊：“打倒边万选！”声浪震动整个庙院。张万寿随即宣布出发，大家展开了小旗。自治训练班的学员开路，一小的学生在前，各初级的学生在后，高年级在前，低年级在后。一路小跑，经大十字街拐弯向北，进了砖城，从天主堂对面走过来宁洗古民团的一个手枪班，走在我们队伍的前面，替我们开路。队伍走到丁字口拐弯往西，只见宁洗古勒着武装带，持着小手枪，站在铁扎山小庙前面，好象是在给我们助威。我们跑到县政府八字门外，大同学们早已冲了进去，有几个拐回来边走边说：“边万选翻院墙跑了，他们追去了，咱们到警察局去找宋××。”说着就从经古楼下钻过去，顺着布袋街直奔警察局。这时队伍也乱了，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前冲。当我们跑到文庙街时，只见大同学们已把警察局长宋××揪出来了。这时已是下半后晌了，一个同学喊着说：“咱们胜利了，今天放学回家，明天早点来上学”。这时我才觉得又累又饿，可是心里很高兴，从来没有过的高兴。

一九二九年下半年，我们向旧社会发动了进攻：触动了教育局长王进之，打了税局，最后打了县长边万选、警察局

长宋××。这一学期没有上多少正课，可是我们学到的知识、受到的锻炼，却比上课多得无法计算。

有一次，三哥对我说：汪老师走了，许多年龄大的同学送他送到大东门外，又送过湍河到七里店。汪老师勉励他们，安慰他们，他们深受鼓舞。最后要分手了，他们都哭了。在这前后，吴老师、李老师和其他几位湖北老师都走了，我们心里很不舒服。不过，学校还有张老师、马老师，同学们也没有散劲。

一九三〇年上半年，是按部就班在上课。这一学期，我住宿在大成殿。农历四月初四夜里，我被吵嚷的人声惊醒，只见一群人提着马灯在校院里，从这个屋子走到那个屋子。最后，这些人带着张万寿，叫他在院子里到处喊：“孙题录！孙题录！”随后，这些人离开了学校。

农历五月初五（就是端午节）的早晨，我们才知道抓走的同学有张万寿、赵振刚、袁森林、杨应麟、丁家志，还有马云亭老师。在吃早饭的时候，我问三哥：“张建华老师呢？”三哥微微一笑说：“他们抓不住！”

早饭后不约而同的，我们这些十二、三岁小同学，含着眼泪带着鸡蛋粽子，到监狱里去看被捕的大同学和马老师。

从此结束了有声有色的、朝气蓬勃的、勇往直前的学校生活，一小变成了死气沉沉的学校。

那时，我时常想起那些敬爱的老师：身躯高大的呈老师，和蔼可亲的汪老师，精明强干的张老师，还有那些湖北老师，你们都到那里去了呢？真使人思念！

现在回忆起来，我仍然怀念那些敬爱的老师，向往那一段朝气蓬勃的学校生活。

一九八五年元月十日

邓县历史上的水利工程

骆 立 群

邓县历史上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地区。农田水利灌溉事业，早在两汉时代已经相当发达。西汉元帝建昭间（公元前38—前34年），南阳太守召信臣于穰县造六门、钳卢等陂、堰，凡三十有一处，广灌溉，人赖其利，蓄积有余。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至十四年（公元31—38年），杜诗为南阳太守，踵召信臣遗迹，造水排，铸农器，修治陂池，广拓土田，郡内比室殷足。民称：“前有召父，后有杜母”，以颂二人之德惠。此后，代有兴修，而宋、明为高潮。西晋有杜预，南朝宋有刘秀之，宋有张永德、谢绛等。尤以宋神宗时，王安石变法，农田水利法为五大新法之一。神宗即位的第二年（熙宁元年、公元1068年），即诏诸路兴水利，次年又颁“农田水利约束法”。至元有杨彥珍，明有赵侯、萧用谦、寇义（寇準后裔）、孔显、张定、程鹏、王道行、潘庭楠等多人，将召、杜堰陂三十有一处，发展到八十七处，诸有刘曰章、赵德等人。这些人兴修水利之业绩载于史册志书。及至邓县解放前几年，仍有土山渠、揣意渠等之兴修，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是为了巩固其统治，经济上，扣发省发贷款、搜刮民财、中饱私囊，但毕竟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，也给建国以后，发展农田灌溉事业准备了一定的基础。

本文据史志记载就邓县历史上较大的水利工程，如汉井、汉六门堤、钳卢陂、三郎堰，明较大规模地修复陂堰和土山洼排涝，清刁河大堤、得子河改道，民国土山渠、杨公渠、瑞黎堰、湍惠渠等十二项，并附宋京汉大运河一项，共十三项简述于下。

我们考究邓县历史上的水利工程，一是为了说明邓县古有“陆海”之称，搞水利、搞农业大增产，自古以来，就是具有条件，具有一定优势的；二是为了展示与褒扬历来劳动人民的功绩与智慧；三是从中找出整治国土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。正如《乾隆邓州志》在“水利”部分所云：“邓之陂堰，自昔为盛。……沧桑以后，陵谷变迁，难卒复也。……然则，得古人之意而师之，岂必拘拘往制哉！”

一、汉井

一九五七年邓县文物大普查中，发现汉井六十七眼。汉乐乡城（今陶营乡高李、马场村一带）、冠军城（今张村乡冠军村）、山都城（今构林乡古村）、涅阳城（今穰东镇）等古城遗址内均有发现。在县文化馆文物展览室存放有冠军的汉井圈，有山都城出土的井砖，还有元庄乡出土汉墓陪葬品陶井模型等。

今夏集乡岗上村与杨策店一带，传说是汉羊册故城遗址，有汉井群。据梅振泉同志反映那里的老年人说，汉井以往很多，密度几乎不超过十亩即有一眼。现在还有十几眼，但有水的仅三眼。过去水量小，仅够人吃畜饮。建国后有了机井，人就不吃这些老井的水，老井水仅用以洗菜饮牲口。

这种老井（汉井），井口直径有两种，一是七十公分，一是一米的口径。结构也有两种，一是井砖砌起的，一是陶筒摆起的。汉井砖长五十公分，宽二十五公分，厚四公分（山都城出土的井砖，弧形，长三十公分，宽十五公分，厚十公分，每砖两头带有凸凹榫）。井砖和井筒均有菱形绳纹饰。

一九五九年《邓县新志》载：“杨册城故址。通过一九五七年普查证实，汉杨册城在今城北夏集乡杨册店村，发现有灰土层、绳纹陶片等。”杨册应为羊册，现在水利地图上又写为杨策店，群众叫马武城。

据与老年人座谈了解，羊册城范围之大，相当于今之邓县县城。以羊册店为中心，程集村有个红堂是当时羊册城的北门，元通寺是东门，岗上村西边有个小庄叫赵集是南门，邓营旁边有个三官殿是西门。汉井群分布在羊册城范围之内。羊册古城址东南郭不远，就是夏集乡的苏营村，一九五七年文物大普查发现这里是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，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汉羊册城在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等正史上不见记载，值得进一步查考。

二、汉六门堤

汉南阳太守召信臣创修。是邓县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。工程早已湮废，遗址在今邓县县城西三里湍河右岸城郊乡的韩洼村。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竖有文物保护碑一通。

《汉书·沟洫志》载：“岂久历宣、元之世，不易其任，故能成其功也。”可知，召信臣从西汉宣帝时任南阳太

守，开始创修，到元帝建昭五年（公元前34年）建成。

召信臣开始修此一工程时，先修堤，原是为障防湍水泛滥，及后，“筑三石门，壅遏湍水，引水灌田。”至汉平帝元始五年（公元5年）乃“更开三石门为六石门。”故人以其为堤，以障湍水之决，而称六门堤；以其以石壅遏湍水，而称六门陂或六门堰（堰者，以土或石障水也），以其可引水灌田而称六门堰。

查《汉书·召信臣传》，召信臣在筑三石门，壅断湍水，引水灌田以后，即元帝建昭五年的次年（元帝竟宁一年，公元前33年），就被征为少府，列于九卿，离开南阳做京官去了。那末，三十八年以后，于汉平帝时，是谁“更开三石门为六石门”？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六门堰堰下设水渠一条。引水渠渠线向南到现在的城郊乡三岔院，渐折向东，走三里桥西南，经张寨北，至八里王西，到白落乡薛窑村老虎桥，东走桑庄乡尹集村，经灌堰、砖桥，以至今西棘阳城遗址南，进入新野县，废水于新野县刘庙村泄入白河。引水渠自三岔院以下至新野入白河口一段。据说，汉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年）和隋开皇二年（公元582年），曹操和杨坚先后在此渠线的基础上，曾开浚为运粮河。

六门堰引水渠下结二十九陂堰，即现今“长藤结瓜”式，向二十九个库、塘、灌区供水灌田，所以，六门堰也可称之为“堰陂群体”。二十九陂堰中包括当时新野县之樊氏陂在内，最大的陂为朝阳县之钳卢陂，水面为九十三顷八十六亩。

《乾隆邓州志》称，“六门堰溉粮，新野，昆阳三县地

五千余顷。”《嘉靖邓州志》谓：“六门堤均水灌田至四万余顷。”昆阳为叶县，此处所称“昆阳”，当为朝阳之误。朝阳县南紧邻山都县，从地势来看，朝阳县之钳卢陂主要灌区应是向东向南效益山都县土地为多。故六门堰应是灌溉粮、新野、朝阳、山都四县地。六门堰灌区，北起六门堰首，东不过湍，南不过潯，西上不过刁，下不过岗（柳峰岗），整个灌区面积不是太大。又，以今看古，当时县小，虽粮、新野、朝阳、山都四县土地面积总合也不会达到四万余顷（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万亩左右）。故六门堰灌溉效益面积应以《乾隆邓州志》所称“五千余顷”为是。

六门堰引水渠从什么地方分支？在什么地方引水过刁河？如何过刁河以灌溉朝阳、山都两县在刁河以南的土地？《邓县地名资料选辑》在《“六门堰”古水利工程概况》一文中称，在王堂村西北侧引水过刁河，解放后，还发现有炭化木桩。其它未详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东汉汲县人杜诗，建武七年（公元31年）出任南阳太守时，踵召信臣遗迹，整修六门堤，在“召堤”之外，增筑新堤，人称“杜堤”，并修治陂池，人获其利。

此工程于汉末毁废，至晋太康三年（公元282年），镇南大将军、当阳县侯杜预复修，利加于民，时人又号曰“杜父”。太康五年，其部曲主安阳亭侯邓达等人于六门侧立有石碑刻记其事（见《晋书·杜预传》）。此后又复废不修。

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说：“南朝宋时修复汉六门堰（在河南邓县西），溉田三万亩。”查《南史》与《宋书》载，南朝宋孝武帝刘骏镇襄阳时（公元445—448

年），因粮西六门堰，良田数千顷，堰久决坏，公私废业，乃遣抚军录事参军刘秀之修复之，灌区由是大丰。后复废，直至“宋知州谢绛复壅湍水，注钜卢陂溉田，兼障湍水泛滥之害。今陂堰俱废，直谓之‘六门堤’矣！”（语见《乾隆邓州志》）。

在近两千年前建成这样规模的水利工程，确是一项伟大的功绩。《中国水利史稿》称其与战国时期秦之都江堰、魏之引漳灌邺工程媲美，实不为过。《邓县地名资料选辑》说今日六门堤“长堤故址，至今犹存，可供国内外广大考古学者和治水之士参观、考研”。

三、汉钜卢陂

《南都赋》：“陂泽有钜卢”是也。《嘉靖邓州志》载，召、杜在邓为陂、堰三十有一。钜卢是其中最大之陂，也是六门堰下接二十九陂、堰之最大之陂。如《邓县地名资料选辑》所述，因该陂其形如钜似卢（卢呈“L”型，饭器也），故名。志书称又名迪陂。但不是狄陂，狄陂在钜卢陂之东，刘集乡厚桥之南，由白龙渠注之。

钜卢陂位于汉朝阳县境，今邓县城东南刘集乡王堤村西南，北起王堤村，南至今构林乡岗岔楼村一带，即在汉山都城与朝阳城之间。召信臣修成之时，原由六门堰引水，于王堂村过刁河灌陂，水旺，陂南北堤长八里，东西堤三里，总积水面积九十三顷八十六亩。当其时，可东向与南向效益古朝阳与山都两县之地“三万八千亩”（见《邓县地名资料选辑》）。汉末六门堰与其下接二十九陂、堰之引水渠，时久